

第四卷 文学评论

社埃文集

花城出版社
林彬 杜友林 编



第四卷 文学评论

彬彬 杜友林 编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杜埃文集 (第四卷) · 文学评论卷

杜埃著, 林彬 杜友林编.

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360-3463-6

I. 杜 ...

II. ①杜 ... ②林 ... ③杜 ...

III. ①杜埃 - 文集 ②当代文学 - 文学评论 - 中国 - 文集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3508 号

责任编辑: 黄茂初 湛伟恩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平面设计: 王 越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

(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5.5 2 插页

字 数 360,000 字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3463-6/I·2883

定价 (共四卷): 1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作者像

与林默涵（右一）、周扬（右二）、张光年（右三）、
许士杰（左二）等同游肇庆七星岩（1978年12月）



与广东文艺界人士合影



在叶剑英同志家中合影



与刘田夫、欧阳山及华南艺大学员合影



与关山月合影



与姚雪垠合影

序

茅盾

我和杜埃同志为文字之交，开始于香港《立报》副刊“言林”。《立报》是小型报纸，副刊“言林”的地盘，自然很小。《立报》在上海发行时主编“言林”的，是谢六逸。抗日战争爆发，萨空了将《立报》迁移香港出版，邀我编“言林”。谢六逸编“言林”时，使这小小副刊五花八门，生动活泼。我没有编副刊的经验，当时学步六逸，也需要短小精悍的短评等，杜埃同志极力支持，积极投稿，使“言林”生色，至今我犹感谢他的雪中送炭。

现在杜埃同志把上起 50 年代，下至 80 年代第一年所写的评论文章整理出版，要我写一篇《序》，回顾往事，不胜感慨，写《序》之事，义不容辞。

杜埃同志不但写了许多文学评论，也写了不少散文、小说。作家而兼评论家，两者都有令人欢欣鼓舞、启发同辈及后学的成就，在国内颇不多见。现在仅论其数十年的评论文章。

其一、谈生活是创作的泉源，到生活中，到群众中去，从而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，从而分析问题，透过表象而得其本质，然后形象化而成为小说，这本是杜埃同志自己的经验，故此一辑中的文章极为精彩。

其二、评欧阳山的《高乾大》，陶铸的《理想·情操·精神

生活》，秦牧的散文集《花城》，陈残云的《珠江岸边》，农民作家王杏元的《绿竹村风云》，王汶石的小说《黑凤》，农民作家杨干华的小说集《惊蛰雷》的序，海员作家陆俊超的小说、特写，部队作家金敬迈的《欧阳海之歌》，电影《春雨潇潇》和《海外赤子》，真是目光四射，百草千花，尽收药囊，读之如暑天得啖冰雪。

其三、谈文学的党性原则，列宁论党的文学原则，鲁迅与青年作家等等，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性问题和青年作家的培养问题。《文艺讨论中的几个问题》，则是配合 1956 至 1957 年的争鸣，而就此一争鸣之偏左发展提出一些问题，加以探讨，归结于必须世界观与文艺规律同时重视。《循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前进》一文和谈到文化工作与艺术创作上的几个结合，和在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论及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和其它党的文艺方针、双百方针的再次强调，带来文艺园地的满园春色。而推倒阴谋文学的所谓理论，必须彻底干脆。

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，文艺民主问题，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等，都已提上日程。杜埃同志此一评论文集应时问世，实为文艺园地灌水培土，此非我个人私见，盖亦公论也。

1980 年 5 月 北京

我的创作历程

(代序)

杜埃

编辑部要我为这集子写篇序谈谈创作经验，我并没有什么经验，只好勉为其难的写点学习创作的历程吧。

1925—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，正是我的少年时期。那时生长在穷乡僻壤的我，曾为这亘古未有的革命所震动、亢奋。那时脑子里很蒙胧、幼稚，但也有过毕生难忘的两件事：一是，有一天上课，白发苍苍的杨芝寿老师激动得抖起一张《申报》，慷慨激昂地向我们宣讲上海发生了“五·卅惨案”，日本侵略者残杀我纱厂工人顾正红，引起全国大罢工、罢市。紧接着县里学生下乡来宣传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列强。使乡村少年们有了个为什么要反帝的初步认识。第二件事是，军阀陈炯明的败兵被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东征军追赶逃来我县，我村位于通往县城直达闽西之路边，一群残兵窜来我村后，除豪绅之外，全村都惨遭洗劫。许多青壮年被拉夫。我的家里只有年迈的外祖父母留在家中，我跟年青的两个嫂嫂和邻居许多人逃到山里去，睡在高山峡谷的草地上，过了许多日夜。半月之后，残敌终于撤走了。我和乡亲们下山回到村里，才知道敌军一个旅部驻扎在我村，我家也驻过兵。所有门板都被撬下，米粮被掠一空，洋铁桶一类较值钱的东西也被掳走。到处拉上屎尿，臭气冲天。从那时起，我幼小的心灵开始痛恨封建军阀。

又过了一阵，东征的革命军开到。不久，区乡农会成立了，到处宣传打土豪，减租息；我们小学的老师把我们组成儿童宣传队，越过十分陡峭的“梯子岭”，到百侯去宣传，因为那里正成立区农会。尔后乘民船顺着百侯河到湖寮区宣传。

经过了这些惊天动地的新鲜事，使乡村少年的我们对为什么要反帝反封建有了更多一些感性认识。四处都轰轰烈烈闹起来了，杀了一些罪恶满盈、血债累累的首恶劣绅，村子里办起妇女识字班，老师和部分高小学生到夜校去教识字，同时宣传革命大道理。大家活跃得很，热气腾腾。

但是，好景不常，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突然发动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继而广州也发生“四·一五”惨案。我县也很快成立了“清党委员会”，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青年。白色恐怖立时笼罩城乡，革命被镇压下去，几位抛头露面的老师也于夜间逃亡了。革命转入低潮。那时不断传来县里捕杀工农群众的消息，其中有懂得几国文字的从上海、汕头回县参加革命的大学生。被杀的人，男的有些被砍头、剖腹，挖出心肝炒了吃；女的被轮奸后，割去乳房，用竹子插进阴部，裸尸示众，惨不忍睹。这时我思想上盘旋着三个问题：一，听见这些惨状，十分悲愤，那些人竟比土匪还野蛮；二，同情被屠杀的人，听见被杀的有懂几国文字的大学生，心想他们有那么高的学问，做的事一定不会错，但我不理解那些杀人者为什么要反对这好端端的革命，心中感到迷惑；三，渐渐地，我从恐怖和迷乱中开始认识过来，在内心仇恨起县里的“清党委员会”，他们都是蒋介石反动派的刽子手。但是，革命毕竟已经失败，到处“清乡”，人人自危，幸存者已远走他方，四处一片沉寂。几个月后我勉强进了县里初中，没多久，南昌起义军南下闽西

经粤东攻打潮汕，起义军经县时，我们不少同学，手挥小旗子，兴高采烈去欢迎。起义军镇压了一个未及逃走的清党委员头头，城乡革命烽火重新燃起，起义军在周恩来、贺龙将军领导下占领了潮汕，谱写了历史上难忘的潮汕“七日红”。为了捍卫红军占领潮汕的后方及掩护红军撤退，朱德将军在三河坝与强敌激战三天，掩护红军经百侯转移闽西。

红军败走后，全县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，广大地区的革命再度被镇压下去，本县的一些革命同志上山开始组织游击队。

红军走后，我因家贫在初中仅读了3个月书便失学了。那时我虚岁15，闲居家中，伤感彷徨，便开始阅读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封神榜》等旧小说消闲度日。因小学毕业时成绩不错，半年后，村中小学的老校董叫我帮一位低年级教师代课。这样，我就当了一年的义务教师。后转为半义务教师，每月薪水3块钱，可帮补家中余米。就在我当乡村教师两年间，事有凑巧，一个奇迹出现了。一天，有两位相知的平素不露面的年长教师，悄悄地领我到学校侧旁一间寡老婆子住的小屋去，上了阁楼，把一副老太婆备用的“长生棺材”揭开，哟，里面放的全是进步书刊，有《列宁主义》、布哈林的《共产主义A、B、C》等等。我特别注意文艺刊物，有郭沫若主编的《创造月刊》、《洪水》、蒋光赤编的《太阳月刊》。记得还有叫《流沙》的刊物以及郭沫若、郁达夫等的小说；还有一本小说《血葬》（恕我已记不起作者，但有点印象，不敢肯定）、蒋光赤的《鸭绿江上》、长诗《母亲》、中篇小说《少年漂泊者》等等。那时我们小学生都不知道，这都是清党时一些进步老师隐藏起来为他们所热爱的红色书刊。从此，我和那两位年长教师便每晚在豆灯下，如饥似渴地悄悄阅读，那情况现

在想来真有点如狼似虎的在“吃书”。那时理论书籍看不懂，也没水平理解鲁迅著作，我最爱读的是蒋光赤的小说，其中特别爱读《少年漂泊者》。它反映了当时民生凋敝，农村破产，到处是封建黑暗，青年人苦闷没出路，渴望追求光明。书中所写的对现实的不满和我所处境况相似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。从此，便再也不看旧小说了，专看启蒙运动的革命新小说，使我在恐怖、沉寂得像死海般的山村中发现了新的天地，心中有了新的希望，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止的、想到外面去接触世界的欲望。我爱上了革命文学，想走文学的道路。

《少年漂泊者》促使我离乡外出漂泊，1930年正当报上传来红军攻打长沙的消息时，我结伴到了广州流浪。因失学又失业，不得已暂时寄居在一位同乡家里。经过这家同乡介绍，我曾当过一个月的抄写员，后来又失业，又由这家同乡介绍在伪民政厅办的所谓“地方自治讲习所”当图书管理员。这是个小小图书室，只摆着一个玻璃书柜，内装一些我不爱看的旧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反动书店出版的反动书籍，还有几份反动报刊。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。书没几本，空闲得很。我便将所得的微薄的工资，到“上海图书杂志公司”、“北新书店”、“现代书店”、“开明书店”去购买还未读过的蒋光慈（这时由光赤易名为光慈）的全部著作以及上海左翼文艺书刊，夜间除一个老头看守之外，受训员都住在外面，我的床就搁在小小图书室里，每夜关上门，悄悄阅读至深夜，这时已是17岁多了，便一面阅读，一面开始学习写作。

我的投稿是经过颇长一段坎坷经历的，当时写的都是农村所见所闻，大部分以自己家庭、邻间亲友为题材，反映农村的穷困生活，写好之后便向当时附有大篇幅纯文艺版的《广州民

国日报》投去。我先后共投了二三十篇，一篇也不见登出来，我便把其中一些篇章重新誊好投寄到香港报纸副刊去，竟然被采用了好几篇。我又继续写，其中不少是没有生活基础，凭想象去虚构的（现在回想起来，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劲，差不多每三两天便可写一篇）。但是，仍然不见刊出，连稿子也不退回（虽附有邮票）。我并不因此灰心，仍然执拗地投去。有一件事使我印象颇深：我晚饭后到永汉路（即今北京路）逛书店时经过一条小巷，见到一间平房门口有个作了几分打扮的年青姑娘倚门伫立，逢衣冠楚楚的男人走过就频频微笑，拿势作状，还有听不清的暗语。当然，我这个穷青年没受到青睐。我平时看报上的社会新闻说市内除公开的妓院外，还有不少穷家妇女姑娘被迫当暗娼。这类新闻材料使我联想起那黄昏时倚门而立的姑娘，猜测她可能就是暗娼。便联想到我过去所接触过的一些人物，经过一番酝酿和虚构，写出了个姑娘因家庭贫苦，父母生病，弟妹衣食无着被迫当上暗娼的小说。安上《零卖》的题目，投到报馆去。事情就是这么突然出现了，不几天，忽然看到《民国日报》文艺版上有我署名的一篇小说发表了，心里自然喜不自胜，但小说的题目却被编者改为《私娼》，大概这样的标题可以吸引小市民吧。真怪，从此以后，我投去的小说、散文大多数都被采用了，每月可收到三几块钱稿费。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，这算是我学习写作的第一阶段。

“八·一三”淞沪抗日战争终于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断送之后，全国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、请愿，群情汹涌，声势浩大。广东军阀陈济棠同南京政府一样，先是叫嚣“抗日者杀”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（即先剿共）；后来看看大势所趋，形势迫人，广东反动当局变了个花招，假抗日之名，下令广州大、中学校

一律实行极严的“军事训练”，用“军训”把学生禁锢在校园里，不准上街示威。群众愤慨，痛恨军阀。这时进步同乡、中大学生江穆等和我便集资出版了一个秘密刊物《火花》。这是一个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揭露“军训”阴谋，以政论为主兼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很强的秘密刊物。除写稿外，我还负责到与江穆有关的（当时江不对我说明）印刷店去校对刊物的全部稿件，并部分负责秘密发行（如邮寄大、中学校学生会、图书馆、同乡会、亲友），假名“寄售”，把刊物拿到书店和学校传达室去。秘密刊物出了两期，即遭反动当局严禁和追查，并在报上及伪省政府民政厅“公报汇编”上刊出“共匪刊物《火花》”的禁令。我暂避到我在世界语夜校读书时认识的进步朋友陈波儿（后来成为著名进步电影演员，解放初期因心脏病逝世）和任泊生家里去。因刊物没注明地址，特务暗探一无所获。但刊物因此也不能再出版了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断断续续向报社发表小说、散文，内容多是迂回曲折，用晦涩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。这时萧殷、楼栖、华嘉、浏心（现名廖子东）等都写了不少稿。不久，“宁粤分裂”激化，广东军阀为了捞取政治资本，打出“倒蒋抗日”旗号，设立“西南政务委员会”，与蒋介石政权分庭抗礼，这个时期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和陈济棠假抗日的花招，楼栖、萧殷等和我写了一批抗日题材小说，我还写了不少杂文（主要受了鲁迅在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办的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上及左翼文艺刊物上化了许多笔名写了许多锋利杂文的影响），讽刺蒋介石政权不抵抗主义。我写的杂文有些篇至今还记得，如《佛法无边》、《不见为净》、《杀人与看杀人》等（当时蒋政权为转移全国人民的抗日视线，厉行“读经复古”、“佛教救国”和所谓“新生活运动”等等），

这些杂文颇为隐晦，也能在《民国日报》副刊发表（能发表的另一原因是该副刊姓厉的编者有点自由思想）。也许可以说，这是我学习写作的第二个阶段。

《火花》事件之后，我放弃了图书室管理员小职，与进步画家何仪（被新加坡殖民当局驱逐回来的进步同乡）同住在一所为穷青年寄宿的由古老祠堂改成的破旧“学旅”的一个小房间里。那时鲁迅为主帅的“上海左联”正在进行猛烈的战斗，文化反围剿步步深入，出了众多刊物，这些左翼刊物出了被封，封后改了个刊名又出。这些左翼文艺刊物和一些政论、理论刊物在广州书店还可以及时买到（迟买就被反动当局发觉禁售了）。鲁迅和他的众多战友们如周起应（周扬）、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、胡风等等在上海的英勇、顽强战斗，给广州的左倾青年带来极大的鼓舞，这时五羊城中纷纷成立秘密的读书会。在读书会中，我开始读了多本社会科学理论书籍和苏联许多长篇小说（见本集收入的《左翼文艺的光芒》一文，在此从略），我得到一些理论知识。同时欧阳山、草明、易巩等亦在广州组织“普罗作家同盟”以及他们发起而我们也参加过的带统一战线式的“作者俱乐部”。在它们的推动下，蒲特（饶彰风）和我便编辑出版了大型地下文艺刊物《天王星》。楼栖、江穆、蔡雨村（语村）、邝明等多人都参加。《天王星》出至第三期，即遭到反动派追查禁止了，我们一批人便避到九龙去一段时间。因为敌探已侦察到《天王星》的主编人严蒲特（饶彰风）已逃走，而刊物全部稿件的作者都是化名的，敌人一筹莫展。事件过去之后，除彰风外我们又返回广州。我继续在报上发表小说、散文。不久，“广州左联”、“社联”、“剧联”成立，出版了联合的秘密刊物《新路线》，这刊物是以已牺牲的凌伯

骥和现仍健在的江穆为主要编辑人，我写了反围剿的散文诗。可否这样说，这是我所走过的创作历程的第三个阶段。

著名的“一二·九”北平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下，由党秘密领导，第一次以无比的声势冲破了蒋介石镇压学生救亡运动的铁栅栏，全国学生救亡运动史无前例地广泛深入开展，上街头，下农村。接着“西安事变”爆发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联合抗日主张。

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区有点民主气氛，可以公开组织文艺团体和出版文艺刊物了。我先后为《突进》刊物撰稿和参加《艺协》抗日活动。不久，我就被派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，在公开代表廖承志、以及连贯等领导下做公开的文学艺术界统一战线联络工作。这时期除为香港各报刊写抗战政论之外，开始着重写抗战文艺理论、评论。并在茅盾主编的《立报》副刊《言林》及《文艺阵地》上发表文艺理论和散文《不朽的城》、小说《老园主》等等。如果恰当的话，这是我从事文艺工作的第四个阶段。

因为抗日战争中国内反共高潮一个接一个到来，蒋管区许多进步文化人不能立足，为了向海外抗日宣传，而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甚为热心，著名老文化人胡愈之、郁达夫、巴人、王纪元等等都到了南洋。也是为了扩大华侨爱国宣传及为八路军、新四军捐款，在“皖南事件”前后，我和一批战友也远渡重洋到了海外一个侨区，这期间与侨团一起创办《建国周报》，主要负责写政论（当时皖南事件反映到海外，舆论界对民主与独裁，团结与分裂，论战激烈。我们反对蒋介石针对解放区而提出的所谓“一个政府、一个党、一个领袖、一个军队、政令军令统一”谬论连续进行批判，这时希特勒法西斯几